

# 将标准化成果转化为文物治理效能和行业发展动能

——全国文物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李黎答记者问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标准化连接科学保护与现代治理。站在“十四五”收官、“十五五”开局的历史坐标上,精心谋划文物保护标准化工作全局,更好发挥标准化工作在文物保护工作中的基础性和引领性作用。近日,全国文物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李黎就文物保护标准化工作“十四五”时期主要成果与“十五五”时期工作重点接受记者采访。

问: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文物保护标准化工作取得了哪些进展?

答:过去一年,在国家文物局党组领导下,在各位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文物保护标准化工作扎实推进,在标准制修订、宣贯服务、人才培养、国际突破等方面均取得了重要进展。

发布文物建筑防火、文物脱盐处理、修复方案编制要求、金属文物封护和缓蚀等6项行业标准,完成《文物进出境标识使用规范》等5项国家标准和《世界文化遗产地风险管理》《术语》等7项行业标准的复审,为标准体系优化奠定了坚实基础;组织《文物保护单位开放服务规范》等3项国家标准和《可移动文物三维数字化采集与加工》等2项行业标准宣贯会,编制《文物保护专用设施标准应用案例集》,标准宣贯进一步加强;举办“文化遗产保护国际标准化培训班”,来自全国多家文博机构、高校和研究院所的约200名学员参加了线上线下培训,有效提升了从业人员对国际标准的理解与应用能力;组织举办国际标准化组织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委员会(ISO/TC349)第一届年会,来自全球22个国家的80余名代表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参会,会议期间推出文化遗产保护国际标准化宣传视频《器作有度 文明互鉴》,刊印文化遗产保护标准专刊《中国标准化(英文版)》,系统梳理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标准化探索与实践以及取得的成就,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顺利完成了全球文化遗产保护领域首项国际标准提案《文化遗产保护—馆藏文物防震—总体原则与要求》的立项与工作组成立,国际标准话语权迈出实质性步伐。

问:“十四五”时期,文物保护标准化工作整体上呈现出怎样的发展态势?

答:回顾和总结“十四五”时期,文物保护标准化工作整体迈上新台阶。顶层设计方面,发布《“十四五”文物保护标准立项指南》,明确了重点领域和优先方向,为标准制修订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引。标准供给方面,五年来共立项文物保护标准项目43项,发布国家标准、行业标准65项,截至2025年底,归口全国文物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简称“文标委”)现行国家标准63项、行业标准118项,已覆盖不可移动文物、可移动文物、考古、博物馆、信息化等主要场景,为行业治理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标准支撑,标准体系的覆盖度和协调性显著提升。标准宣贯与人才培养方面,2023年和2025年先后在敦煌研究院和故宫博物院举办“文物保护标准化能力提升培训班”“文化遗产保护国际标准化培训班”,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标准解读与宣贯,累计培训从业人员300余人次,有效提升了从业人员的标准研制应用能力和国际视野。机构建设方面,2022年成立国家文物局科技教育司,专门设立标准与信息化处,故宫博物院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先后成立专门的文物保护标准化研究机构,2023年完成文标委换届,标准化发展基础更加牢固。制度建设方面,修订颁布了《文物保护标准制定程序和要求》,系统性地规定了文物保护标准化工作在组织管理、标准制定、标准实施与监督等主要环节的要求,进一步提升了标准化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同时在国际标准化方面取得重大突破,2024年由我国主导的国际标准化组织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委员会正式落户中国,实现了我国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国际标准制定中从参与者到引领者的转变,我国多项优势领域标准纳入国际标准研制进程,中国经验正以标准的方式转化为国际共识与共同规则。

“十四五”时期是我们把“标准引领、标准驱动”进一步落到实处的五年。我们深刻地体会到,标准化不仅是技术规范的集合,更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在文物保护领域的具体实现。文物工作越向前推进,越要靠制度化、体系化的方法解决风险叠加、任务叠加、技术迭代的问题。标准化不是“可做可不做”的辅助工作,而是支撑行业治理能力提升、支撑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工程。

问:当前文物保护标准化工作还存在哪些短板和不足?

答: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标准体系建设仍不够完善,基础标准、管理标准供给不足,部分领域存在标准交叉重复或缺失,难以满足文物事业系统性需求;二是标准质量有待提升,部分标准核心指标缺失、技术内容大而化之,缺乏必要的实验验证和技术支撑,影响了标准的可操作性和权威性;三是实施应用仍显薄弱,标准宣贯覆盖面有限,标准执行能力参差不齐,部分标准“落地难”问题突出;四是人才支撑能力不足,既懂文物保护又精通标准化的复合型人才匮乏,基层技术队伍标准化意识和能力亟待加强;五是高质量国际交流亟须深化,文物保护标准“走出去”“引进来”的双向互动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六是秘书处机构能力建设仍需加强,标准任务越来越多,涉及领域越来越细,但专职力量、专业支撑、过程管理工具相对不足。

问:展望“十五五”,谋划文物保护标准化工作全局,重点工作和远景目标是什么?

答:在“十五五”时期,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任务为主线,以更高站位谋划文物保护标准化工作全局,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是强化顶层设计,构建多元标准化体系。要紧紧围绕文物事业发展需求,坚持创新引领和质量效益原则,系统完善标准体系顶层设计,推进标准供给由技术标准为主向基础标准、管理标

准、技术标准并重转变,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加强文物安全防护、保护修复修缮、考古、展示利用等领域急需标准制修订研究,优先支持技术导则、术语等标准制修订,探索研制文物保护材料、专用设备、工程质量等方面的标准。健全科技与标准化互动支撑机制,及时将先进适用科技创新成果融入标准。要聚焦文物风险评估、自然灾害防控、应急处置、人员安全、藏品安全、网络安全等文物安全防范相关领域推进标准研制。以“成熟一批、转化一批”的原则,谋划强制性国家标准体系建设,发挥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底线作用。开展整合优化与修订工作,强化标准之间的系统性和协同性,切实提升标准体系整体效能。

二是优化标准供给,提升质量实效。标准质量是生命线。标准供给不仅要“填补空白”,更要注重“提升质量”。要进一步优化标准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严格把控标准制定与修订各环节的质量。严控研发环节,严把审查环节,严抓实施环节,将标准实施纳入绩效评价体系,提升标准的约束力与执行力。

三是深化宣贯实施,释放标准效能。要创新标准宣贯方式,构建多层次、广覆盖的宣贯体系。结合线上与线下渠道,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开展标准解读与培训,扩大受众覆盖面。针对不同对类分类施教,面向行政管理人员突出政策衔接与管理要求,面向一线人员强化操作规范与技术要点。同时,要开展标准化试点示范工作,推动央地共建博物馆、遗址类博物馆加入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综合标准化试点;围绕文物保护工程质量监督、文物保护装备检验检测、文物保护材料性能评价等方面设置标准化试点项目,打造一批标准实施示范案例,发挥引领带动作用。

四是加强人才培养,夯实发展根基。加快构建标准化人才梯队,完善培养体系。通过专题培训、项目实践、国际交流等多种方式,提升从业人员标准研制与应用能力,重点加强中青年技术骨干的培育。支持高校设立文物保护标准化相关课

程,推动学科建设与行业需求对接。建立专家咨询机制,吸纳多领域高层次人才参与标准研究与评审工作,形成跨专业、跨领域的协同创新团队。注重基层人才培养,强化标准实施一线人员的技术指导与能力建设,切实提升全行业标准化工作水平。持续完善人才档案库建设,实现动态管理与精准服务,为文物保护标准化事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智力支撑。

五是拓展国际合作,提升国际话语权。统筹文物保护标准“走出去”“引进来”。要充分发挥国际标准化组织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职能,持续推动我国优势领域标准提案转化为国际标准,优先开展文物术语、病害分类、预防性保护等国际标准研制,增强我国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规则制定权与话语权;组建文化遗产保护国际标准化专家库,支持优秀人才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培育和提升文物领域国际标准化能力;继续加强国际协同与项目统筹推进,衔接“十四五”成果,推动更多“先进适用、可落地”的国际标准形成共识,服务全球文化遗产保护;将中国标准融入援外文物保护工程,以实践检验标准普适性与先进性,向国际传播中国技术、方法与标准,贡献中国智慧。发布国家和行业标准外文版,推动中国标准“走出去”。

六是完善体制机制,强化组织保障。健全标准化工作统筹协调机制,强化文标委与主管部门、地方文物部门、技术机构之间的协同联动,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工作格局。加强标准化工作考核评估,建立年度任务清单和责任台账,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在“十五五”开局之际,我们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到标准就是拉高线、保底线,以更强的责任感、使命感,把标准化这项基础性、战略性工作抓得更实、更深、更有成效。让我们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同心同向、协力攻坚,推动文物保护标准化工作再上新台阶,为引领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 以仪式为纽带 以情感聚人心

——天津博物馆文化传播路径探索

贾曼



天津博物馆跨年书信主题音乐会



天津博物馆“奥地利施瓦策瑙古堡与紫禁城的相遇”大型芭蕾舞演出活动



记忆与节日情感永久留存,使“博物馆跨年+看新展”成为新风尚。

### 织就情感联结纽带,构建精神文化家园

各类仪式感成为具有吸引力的“旅游IP”,源于大众的情感需求。在快节奏、碎片化的时代,人们不满足“看风景”,而是要“找共鸣”,寻求情感价值的深层供给。与公众建立深度情感联结,也是天津博物馆近年来重要的实践方向。通过策划特色文化活动、特殊群体关照和及时信息反馈,天博致力于成为一座有温度的博物馆,一方以文化为根、体验为魂、情感为桥的城市“栖息地”。

仍以跨年活动为例,当烟花秀、倒计时、放气球、演唱会成为跨年“标配”,不少观众寻求更具文化内涵的“重启”新场景。天津博物馆的书信主题活动便提供了一种新路径。书信作为中国传统文华中极具温度的情感表达形式,承载着“见字如面”的真挚情谊与“纸短情长”的文化底蕴。天博结合跨年推出书信活动,将书信文化转化为公众可参与、可体验、可共鸣的文化实践。打破“我展你看”的单向传播模式,通过书信征集、漂流、展示、赏读等多元参与路径和双向反馈机制,让公众从文化旁观者转变为主动共建者,实现了博物馆与公众的“双向奔赴”。

写信是私人情感的抒发,而天博通过有组织的策划,让个体情感融入集体共鸣,公众既是情感的表达者,也是情感的接收者。跨年音乐会上的书信赏读环节将这种双向联结推向高潮,“高山流水”“岁月留声”“尺牍传情”“共赴新程”四部分分别展示观众来信中与古人言、与友人书、与自我对话、与天津这座城的情感羁绊、与博物馆同好的共鸣等多维度情感,满足了观众通过主动参与和个性表达,

将跨年的“集体性时间坐标”转化为专属于自己情感叙事的需求。信件慢递则让博物馆成为公众情感记忆的“储存器”的同时,进一步延长了活动的情感价值。

此外,天津博物馆坚守“服务无形、体验有温”理念,持续构建无障碍服务预约机制与情感化服务流程,以提升观众体验。如积极探索以手语讲解视频形式推进无障碍服务,成立专项服务小组,为听障观众针对性制作了涵盖200余件文物的手语讲解视频,其中不少文博术语的规范化手语表达具有开拓性,有望为未来文博行业手语词典的编纂提供重要参考依据。有温度的文博服务还体现在对观众心声的倾听与反馈等方面。天博新媒体矩阵组建于2019年初,经过几年的探索与发展,已经成为博物馆与社会公众的重要桥梁。

新媒体的即时反馈,打破了博物馆“高冷”“枯燥”的刻板印象,拉近了博物馆与社会群体的距离,使得观众与博物馆之间的交流更接近于“人”与“人”的交流。天博新媒体矩阵“以人为本”,长期保持与公众高频次、多维度、深层次交流。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全年通过官方微博发布超3500条,小红书发布300余篇,微信平台发文1490条,订阅号“天津博物馆TJM”更是保持3篇日更新量,保证公众对天博动态的及时掌握。新媒体还通过设置“观众说天博”“我与天博的故事”等专栏,为公众开放展示平台,加深与博物馆的情感联结。一年来微信平台用户互动与粉丝增长成效显著,粉丝数已突破125万,全年累计收获用户留言及互动超过2000条,且对用户提出的有效建议及时收集采纳,为博物馆发展提供有益支撑,更让观众在参与中感受到文化传承的温度,真正实现博物馆与公众的“价值共生”。

(作者单位:天津博物馆)

### 观点摘编

#### 《五马图》中“满川花”非李公麟真迹

王连起在2026年第2期《故宫博物院院刊》撰文《关于李公麟〈五马图〉的问题——访日看画纪闻之一》认为:李公麟《五马图》是流落海外的旷世名作,通过仔细看真迹原件并考证文献,五马中的前四马确为李公麟真迹,第五马“满川花”则并非原作;卷上的黄庭坚题字为伪作;卷后黄庭坚、曾纡题跋为真迹,但黄庭坚题名存有疑问;此图原为墨笔白描,现有的色彩系明人所加。五马中的前四马确为李公麟真迹,其描绘栩栩如生,艺术水平极高。第五马“满川花”在画法、风格、艺术水平上与前四马有明显差距,人物面貌程式化,马尾鬃毛线描潦草,马眼刻画呆板,且原应有的黄庭坚题记已被移走。卷上前四马的黄庭坚题字为伪书,其书法全无黄书沉着劲健之风,且题记内容经考证亦为编造。卷后黄庭坚题名“黄鲁直书”四字笔力薄弱,值得怀疑。此图现有色彩系明人所加,现场观感设色不自然,部位不合理,且文献记载李公麟作画“不施丹粉”。加彩时间推测不早于明代。

#### 从文化源头汲取创新力量

汪品先在2026年1月21日《学习时报》撰文《从文化源头汲取创新力量》认为: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积淀了丰富的科技思想资源。先秦时期,《周易》提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易观,体现了对自然规律动态演化的深刻探究;《墨经》中包括了几何光学、力学原理等早期科学萌芽;汉代张衡发明地动仪,唐代僧一行实测子午线长度……这些成就表明,中华文明并不缺乏科学创新精神,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了有别于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路径。16世纪以前,影响人类生活重大科技发明约有300项,其中中国人的发明占175项。今天,我们应以高度的文化自信重新审视这些遗产,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进行批判性继承、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发掘和释放科学创新潜力,就必须回归文化根源。只有培育适宜的文化土壤,创新的幼苗才能茁壮成长。我们当前的任务,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深度融合,兼收并蓄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 数字叙事视角下的石窟寺造像资源

杜雨虹、方楷依、刁常宇在2025年第6期《中国文化遗产》撰文《数字叙事视角下石窟寺造像资源的开发策略研究》认为:数字叙事理论为石窟寺文化遗产展示设计提供了新思维。其具有叙事方式的“跨媒介性”、叙事结构的“多维关联性”、叙事体验的“互动性”和“沉浸感”等特征,契合了数字时代下石窟寺造像资源开发与传播的需求。目前,石窟寺造像的传统叙事开发面临叙事媒介单一、叙事结构以单线为主、叙事体验缺乏互动与沉浸等困境。基于数字叙事理论,可从三方面提出开发策略:推动叙事内容有机整合,实现造像价值的跨媒介延伸;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展示传播体系。打造多维关联的叙事结构,呈现多元立体的造像记忆。开发多样化互动形式,构建沉浸式叙事体验。将数字叙事理论有机融入石窟寺造像资源开发,有助于突破传统展示限制,增强叙事感染力与影响力,是创新拓展石窟寺展示利用、有效传播其文化艺术价值的重要路径。未来应坚持以内容为核心,深化理论应用,讲好石窟寺故事。

#### 彩陶纹饰复原与“计算考古学”

涂栋栋在2026年1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报》撰文《人工智能赋能彩陶研究》认为:彩陶是重建史前文化序列与探究文化交流的关键物质遗存。传统二维记录(摄影与线图)存在视角局限与主观性,而现有的三维数字化技术虽能高保真记录,但存在设备成本高、流程耗时长、依赖实物实体等瓶颈。在此背景下,“单张照片三维重建”技术应运而生。该技术能较为准确地复原彩陶器的几何形状,支持形态演变分析与类型学排队等研究,为文化传播路径研究提供数据。在纹饰复原上,则呈现“视觉合理性”与“细节非确定性”并存的特征。该技术目前无法完全替代传统记录手段,尤其在处理非对称或严重残损器物时仍有挑战。该技术的意义超越技术效率提升,它推动了考古资源的资产化,可将海量历史影像低成本转化为三维数字资产;它促进了“计算考古学”的发展,使基于大规模标准化三维模型的定量分析成为可能,辅助发现人眼难察的规律;它重塑了公众与文化遗产的交互方式,提供可任意翻转、缩放的具身体验。